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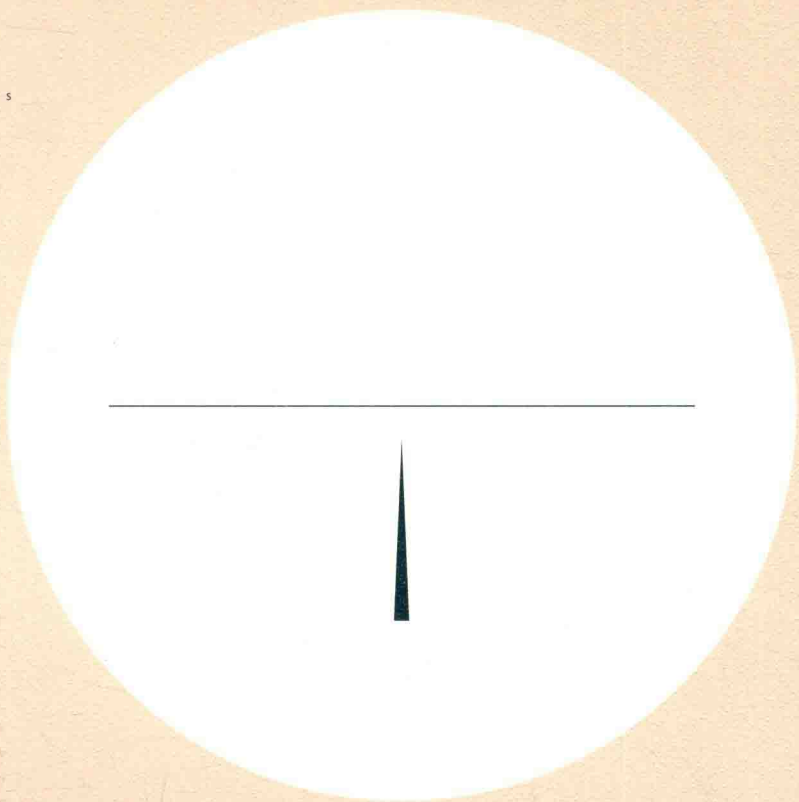
Equality

(with a new introduction by Richard M. Titmuss)

逻
各
斯

l o g o s

猫
头
鹰
译
丛



论平等

[英] R. H. 托尼 著
高景柱 译 曹钦 校

上海人民出版社



R. H. 托尼文字摘录

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当然能够永久地结束整个可恶的阶级优势和阶级劣势，这些优势和劣势是我们现存社会体系的特征和恶习之一。

如果民主能够屹立不倒，那么其原因不是因为它到目前为止仍然屹立不倒，而是因为普通人坚信它将长存，同时致力于拓展其根基。在今天，拓展民主的根基意味着摧毁金权政治，并以平等主义的社会取而代之。

对不平等的漠不关心并不是一个将使各方对立起来的政治问题，而是将各方联系在一起的共同特征和习惯。

显而易见的是，“平等”一词拥有不止一种含义，人们围绕这个词所产生的种种纷争，至少部分是因为大家对其持有不同的理解。于是，它既可以是对事实的一种陈述，又可以表达一种伦理判断。

虽然人们的自然禀赋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但是致力于消除基于社会组织之上的不平等（而不是消除基于个人差异之上的不平等），是一个文明社会的标志。

阶级差异的本质是地位和权力的差异：至少以某些标准来看，它是不同程度的权威和从属关系的一种体现。

财富和权力的巨大悬殊并不是文明的标志，而是野蛮的标志。

一个文明的共同体将会尽力消除产生统治和奴性精神的原因，从而消除那种精神。

文明的共同体应该致力于使权力不要成为一种任意的权力，而应该成为一种负责任的权力，同时，当文明的共同体在社会制度中发现特权的构成要素时，应该尽力清除它。

平等的真实含义在于法律权利的无差异性。当且仅当在这种意义上，追求平等的目标才是适当的，或者才有可能实现该目标。

倘若正确理解机会平等，它就不仅意味着通常认为生活中值得获得的东西应该向所有人开放，而且也意味着没有人应该遭受任意的惩罚。

强者的自由是对弱者的压迫。



上海人民出版社
官方公众号

上架建议：哲学、政治理论

ISBN 978-7-208-17913-4



9 787208 179134 >

定价：68.00 元
易文网：www.ewen.co

逻
各
斯

l o g o s

猫
头
鹰
译
丛

论平等

Equality

(with a new introduction by Richard M. Titmuss)

[英] R. H. 托尼 著

高景柱 译 曹钦 校

 上海人民出版社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平等/(英)R. H. 托尼(R. H. Tawney)著;高景柱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

(逻各斯·猫头鹰译丛)

书名原文:Equality

(with a new introduction by Richard M. Titmuss)

ISBN 978-7-208-17913-4

I. ①论… II. ①R… ②高… III. ①平等 IV. ①D0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2)第165323号

责任编辑 赵荔红

封面设计 人马艺术设计·储平

丛书策划 刘训练

逻各斯·猫头鹰译丛

论平等

[英] R. H. 托尼 著

高景柱 译

出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01 上海市闵行区号景路159弄C座)
发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刷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9.5
插页 5
字数 233,000
版次 2022年11月第1版
印次 2022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7913-4/D·4000
定价 68.00元

本书译自：R.H.Tawney, Equality (with a new
introduction by Richard M. Titmuss),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Ltd, 1964.

《论平等》是过去30年中的经典著作之一，这本书思考并回答了我们的根本问题。在这一版中，理查德·M·蒂特马斯（Richard M. Titmuss）教授——他自己的著作将本书的讨论主题延伸到了50年代和60年代——已经写了一个新的导论，讨论了该书在今天的重要性。托尼教授的观点也许会使任何被当前的富足社会的光环搞得飘飘然的人感到惊讶：英国远非正在成为一个更加平等的国家；古老的不平等只不过是采取了不易觉察和更加复杂的形式；我们的社会已经得到了更好的掩盖，在统计数据上变得更加令人误解。不平等的两个支柱——即通过继承获得的财富和公立学校，托尼教授称之为“遗传性的魔咒”——相对来说仍然没有受到撼动。英国人真的宁愿受到伊顿老校友的统治吗？托尼教授最喜欢的这个问题仍然像往常一样贴切。

（1964年版扉页）

导 论

理查德·M. 蒂特马斯^①

一

当托尼为 1951 年版的《论平等》撰写结论和序言时，英国的经济还没有从“二战”的创伤中完全恢复过来。此后的英国经济取得了实质性的进步，而且就年均经济增长率来说，比 20 世纪 50 年代的进步还要快。然而，为了补偿英国人心甘情愿默默忍受的漫长艰苦岁月，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人们不仅要在战争年代为其非常珍视的自由付出代价，在战后同样要为自由付出代价。

然而，在和平时期，人们并不愿意接受他们在激烈的战争中所承担的代价。如今人们又有了在不同的经济需求和社会需求之间做出选择的权利。这是他们应得的。忍耐已经不太算得上是一种纯朴的美德了，特别对那些——不像托尔斯泰笔下的各种角色——还没有习惯于被习俗和等级拖住步伐的人来说更是如此。

对那些拥有较多特权的人来说，他们想象的即将到来的 20 世纪 50 年代的英国，与拥有着平静的乡村豪宅的爱德华时代的英国相似，他们很

^① 理查德·M. 蒂特马斯 (Richard M. Titmuss, 1907—1973)，英国人，现代社会政策理论的创始人，20 世纪对英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社会福利思想产生深远影响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家。——译者注

难去接受计划、国有化以及“福利国家”的优点。与工会、英国医学协会（the British Medical Association）以及律师协会（the Law Society）一样，他们想平静地生活在传统的命运中，不要受到干扰。他们在那时想象不到，自己能从利用（以及比别人更好地知道如何去利用）我们现在所谓的“社会服务”中获得多么大的收益；他们也没有意识到，在一个阶级分化根深蒂固的社会中，“超阶级”的服务（在实现那些处于不平等的环境中的人们的机会平等这一意义上而言）是不可能实现的；他们也不懂得欣赏社会主义的行政当局所取得的一项积极成就，即抑制了土地投机商和房地产开发商的疯狂掠夺长达六年之久。最后，他们几乎没有开始明白，收入、财富、教育和享受体面的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平等，也许可以被视为快速的经济增长的民主前提条件之一。

1951年，托尼利用他的历史学家的富有预见性的眼光，发现了一些将至的现象的征兆。但是，他也发现了一种更加强烈的征兆，即“一种更加平等的社会秩序即将出现”。自1938年以来，有一种乐观主义的态度认为反社会的不平等已经减弱，托尼认为，这一乐观主义态度已经被很多证据证明是有道理的。正像他一直以来总是那样做的，也正像社会主义者应该继续那样做的，托尼首先考察了收入和机会之间不正当的差距的两个最庞大的支柱，即通过继承获得的财富和教育体系。他指出遗产税已经被大幅度地提高了，以至于就1 000 000英镑及其以上的遗产而言，国家已经征收了80%的税，甚至更多。托尼根据税务委员会（the Board of Inland Revenue）的官方统计数据，推断出“今天，现金收入上的差距——即使它们仍然是惊人的——不怎么像在不远的过去时那么令人惊讶”。更重且更多的累进税（graduated taxation）已经

生效，那些“庞然大物们”，即居于顶端的税后收入，在规模上已经显著地减少了。

那些已经逐渐在充满懊悔的（apologetic）20世纪扎下根来的教育和社会服务的发展，是恰当的乐观主义的另一种原因。托尼特别希望，服务于所有儿童利益的1944年教育法案能够得到完全的执行，同时，某个阶级私有的“公立”学校——这是特权和势利行为的堡垒（托尼所使用的词语）——将彻底转变成一种为公众利益服务的机构。

在1960年末，80岁高龄的托尼开始考虑为《论平等》撰写一篇新的导论。他像一个学生想继续“接受教育”一样，让我们为他提供一份阅读清单。他已经再次沉浸于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时期的英国，想去理解20世纪50年代的英国。然而，这个任务已经超越了他的能力范围。虽然他的精神像以前一样矍铄，但是他的身体已经很疲惫了；“我睡的太多了”，他说道，虽然他应该比其他人尤其是年轻人休息得更多。

面对现代社会复杂的统计数据，他感到畏惧。他意识到，他和其他人在过去所使用的简单的测量和分析工具，如今已经不适用了。古老的不平等如今拥有了更加微妙和复杂的形式，这在部分上是影响深远的技术变化、社会变化和经济变化所带来的结果。作为生活水平差距的主要信息源的传统公报，已经是肤浅的、误导的或者在整体上是毫无用处的了。

到1960年，英国已经成为一个被掩盖得更好的社会。一些虚构的东西和计算的不精确性在一起掩盖了富人的、中产阶级的或者穷人的生活状况。不平等是政治话语的主题之一，而且从各方面的证据来看，不平等都减少了，同时，英国社会中所存在的贫困现象要么被认为可以通过“自然”的过程加以消除，要么被视为是由不幸之人和不负责任之

人导致的只能永久残留下来的后果。有人进一步主张说，我们之中已经不再存在有钱人了；之前那个对富人毕恭毕敬的阶级，已经用税收把他们的钱拿走了。在保守党十年统治的末期，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实际价值增长了不到一半，但在此情况下，上述观点就成了多数人的意见。对于普通人而言，他的统治者已经用通俗的语言向他宣称：“你们从来没有过得这么好。”他在如此美妙的时刻，被卷入到了市场选择的过程之中，在那里，凭靠着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他能够为自己以及他的家庭购买他们喜欢的任何东西。这就是平等主义意识形态的终结吗？

三

对于调查 20 世纪 50 年代的状况，我也感到畏惧，因为我缺乏托尼所拥有的技能，即使粗略地进行调查，我也不是信心十足。为了有可能同过去的状况进行比较，需要对财富、收入、遗产、掌控的资源、健康、住房和教育机会等方面进行基础性的调查，但是人们只在某些方面进行过这种调查，或者根本就没有进行过这种调查。为了测量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平等的变化程度，所有这些方面现在必须进入调查的议程。对诸如肺癌、冠状动脉血栓和某些精神病等社会疾病原因的流行病学研究，已经表明了对需求、机会和资源的综合考量的重要性。社会和经济不平等有许多不同的和变化着的环境根源，正像生理上的和心理上的富贵病也会有很多根源一样。

如果我们认为我们通过扩大教育机会——哪怕成千上万的儿童还生活在贫民窟中，没有浴室、体面的厕所、娱乐设施、探索的空间以及梦想的空间——就能实现生活机会的社会分配的平等化，那么我们这是在自欺欺人。仅仅通过缩减人们的某个有限阶段的现金收入上的差距，

我们并不能永远实现报酬的更加公平的分配，也不能建成一个阶级和地位差别不那么悬殊的社会。当考虑一个人的整个职业生涯时，依靠某些绝对标准而粗略测量出来的阶级和地位所带来的差异，在过去的十年中已经明显地扩大了。针对那些在事业或职业生涯处于起步阶段的人所经常使用的比较方法，所涉及的时间范围比较短暂，或者只涉及特定的年龄段，在今天已是不合适的，是误导人的。那些言说这些所谓的短暂的富裕（teenage affluence）的评论家们忘记了，针对专业人员和其他阶级的非现金的以及现金的增量报酬的整个复杂系统，在根本上不同于针对体力劳动者的报酬的传统的以及原始的系统。这是我们社会的基本分野之一，同时也可能被认为是最理所当然的分野之一。

例如，考虑一下工人阶级的子女的薪酬问题。为了支持英国是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这一理念，今天这一问题经常被提及。与 20 世纪 30 年代工人阶级的后代的薪酬相比，今天工人阶级的 16 岁的儿子从工作中所获得的真实的现金收入，毫无疑问要比以前要高，同时就每周所挣到的可自由支配的现金收入而言，也许比在学校或大学就读的中产阶级男生们过得更好。有关工人阶级 16 岁或 20 岁的子女的收入的数据表明，他们的收入状况无疑是更好了；这所产生的后果是，他们要比那些在教育上仍然受到国家资助的学生缴纳更多的税收和社会福利费用。

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仅仅按照每年的现金收入来说，中产阶级子女的收益就要比无产阶级子女多 20 倍或者更多，他们还很少生病，拥有更长的预期寿命和更低的退休年龄，能够继承更多的财富，拥有比例更大且更加稳定的退休金，这些不用交税的收益也许会差到 100 倍。他们还能够获得大量的非工资性的收入和服务（这些东西也能免收所得税，因为它们既不是金钱，又不能被兑换为金钱）。来自这些阶级的两

个人通过“社会服务”以及其他再分配机制获得的纳税人的援助，特别是在确立挣钱能力、机会和成就的基础的那个人生阶段，以绝对值而言，谁获得的更多呢？

13

直到我们已经考虑好怎样能够识别、测量和汇集“生活水准”（standards of living）与“生活方式”（style of life）中的所有构成要素，并考虑它们所带来的后果时，这些问题才能获得解答。事实上，为了测度属于不同群体或阶级的人们之间的不平等，我们今天应该怎样界定“生活水准”？我们还必须依照现实主义的界定方式，去考虑人们所享有的一个给定的生活水准所处的时间段，考虑计算单位——无论是个人还是家庭——的决定问题，考虑对那些打算在四代人的基础上分配他们的财富的人以及对那些仅仅拥有一周生活资源的人来说，安全和“生活机会”（life chances）意味着什么。^①

然而，无论人们是否同意平等是一种政治目标，了解这些事实都对民主社会的健康具有特别的重要性。难道我们不应该继续追问，是否社会上或多或少有影响力的权力或地位，被那些有钱人或者其父亲非常有钱的人所占据？是否有或多或少非熟练工人的孩子在15岁的时候辍学，并营养不良、很少能写信或读书？是否在15岁辍学的人和居住在贫民窟中的人所面临的总体不利状况，在今天的英国并不会成为一个很大的障碍，虽然它们在美国已经成为一个障碍（于是使得犯罪成为社会流动的一种仅有的主要形式）？^②晚年是不是不平等将稳定扩大的时期？财富——无论怎样界定、传递或储存——是否会日益集中在极少数

① 有关这些定义问题和测量问题的研究，参见 Titmuss, Richard M.,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Social Change*, Allen and Unwin, 1962, and Wootton, B., *The Social Foundations of Wage Policy*, Unwin University Books, 1962。

② Miller, H. P., “Money Value of an Education,” *Occupational Outlook Quarterly*, Sept. 1961, p.4.

人的手中？

当代美国和英国的很多学者认为，美国和英国已经转化为或者正在不可阻挡地转化为非意识形态的福利国家。在这些学者看来，上述问题已经不会出现了，或者将不再出现。人们都同意说，在过去，那些问题是重要的，但有人主张，通过自动的增长进程以及福利制度的建立，今天的工业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解决了这些再分配的社会正义问题。从政治上而言，仍然具有争议的只是一些政党纲领中的细微差别罢了：每周领取 5 先令或 10 先令的养老金、5%或 7%的年轻人接受大学教育以及 3%或 4%的经济增长率。李普塞特（Lipset）教授在其著作《政治人》（1960 年）中（通过概括 1955 年世界知识分子大会上的讨论）替许多人说出了心声：“区分左派与右派的意识形态问题，（已经）成为一种有关更多或更少的政府所有权和经济计划之争的问题。”他也宣称，社会上存在如下共识：在西方，“无论哪个政党控制国家的国内政策”，实际上很少有什么差异。

14

我们曾经有过激情，现在可把这些“精确计算的多寡问题”留给精于细节之人和学界人士了。剩下的只是社会工程问题，是在管理已有的“美好”社会的过程中所需艺术和技术的混合问题。这昭示了乌托邦思想的终结。人们已经不再有必要去触及政治上的不可能之处。因此，人们必须忙着复兴功利主义理论，并培养富裕时代的新斯多葛主义精神。

大西洋两岸今天正在倡导这些观点的人还没有检视这种历史哲学的更大含义。然而，它们对民主社会的未来福祉有着极大的重要性。如果人们通常认为政治选择应限于考虑技术和管理问题，那么自由和自尊的意识——这种意识隐含于“对人类世俗事务加以有目标的控制”这一概念中——就会遭到削弱。如果在相互冲突的价值之间并不存在激进

的选择，那么我们仅仅遵循技术变化所指引的方向就行了。所有东西都变成社会上各权力集团之间的妥协。政治民主成为一种选择不同的领导人的工具，而不是选择不同的社会目标的工具。经济增长成为一个目的，而不是成为一个服务于自由以及其他卓越目标的手段。在这种环境中，可以假定个人的政治自由感已经被削弱了。他不再感觉到和不再相信，一个非常不同的社会或许能够从政治冲突中浮现出来。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社会进步的理念以及对贫困者和离经叛道者（the deviant）的更加文明的态度就一定会中止。然而，离经叛道者不再可能被人们尊崇为一个有远见的人，不再可能被人们尊崇为一个追寻新的社会秩序的人。如果进步的路径已经被设定好了且是不可改变的，那么对社会规则的遵从（conformity）将成为一种至上的美德。正如托尼评论道的那样，“一个时代的失败者和愚人——像苏格拉底和圣方济各（St Francis）——是另一个时代的智者和圣人。”

15 认为“我们已经抵达——或者将要抵达——一种非意识形态的终点”这一论证的逻辑也意味着，对有关人类境况的真理的追寻，已经不那么迫切了（人类境况的真理指有关社会体系以及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的生活机会的基本事实）。如果“美好的”经济社会已经被建立起来，那么自然而然的结论就是，我们为了使社会保持平衡并对其进行改革而需要的事实，将不同于为了支持激进变革而需要的事实。那些根本性的问题似乎就不太重要了；进行调整所需的技术问题才是更重要的。于是，社会科学将更少关注价值问题和一般性的问题，更多关注技术问题以及提供政治工程师所需要的事实。

在这种简单形式的描述下，上述讨论似乎缺乏紧迫性。有些读者感觉到，我并没有采取公正的方式，去对待现在一些通过非意识形态的视角来看待西方世界的人，这些读者应该阅读近期关于这一

问题的著作。^①

四

于是，我们要问：现在托尼的《论平等》已经过时了吗？平等主义的意识形态与现代社会状况是不相关的这一观点，能够获得证据的支持吗？今天的英国已经实现了平等，以至于我们没有（经济上或道德上的）理由去采取进一步的任何有关集体再分配的措施了吗？

这些问题主要是一些定义问题和事实问题。托尼所表述的社会性与道德性理由，已经具有足够的说服力了，我不想再画蛇添足。托尼并没有在才能的平等、功绩（merit）的平等或人格的平等这些朴素的意义上谈论上述观点。他的关注点在于法律面前的根本平等、消除集体所强加的社会的不平等、所有人能够获得某些特定物品和服务的平等机会、所有儿童都能获得教育以便拥有自由并有能力去发展他们的不同特征、通过发展每个人的禀赋及其同胞的禀赋来扩大个人自由。因此，他特别强调教育以及人们之间的平等交流的关键地位。他还特别强调与“阶级和收入毫不相关的”个人独特性。无论人们在特征和能力方面有多大差异，“事实在于，在共同的人性中，人类有一种值得加以培养的品质，而如果一个社会在规划经济组织和社会制度时能考虑到这种共同人性，如果它不强调财富、出身和社会地位的差异，并在

16

① 一些英国的参考文献有 Titmuss, Richard M.,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Social Change*, esp. chap. i; *A State of England*, Hartley, A., 1963。美国的主要参考文献有：Bell, D., *The End of Ideology: On the Exhaustion of Political Ideas in the 50s*, rev. ed., 1961; Lipset, S. M. *Political Man*, 1960; Galbraith, J. K., *The Affluent Society*, 1958; Wallich, H., *The Cost of Freedom*, 1960。对这些美国著作的一种批判性分析（我从其中受益良多），参见 Rousseas, S. W., and Farganis, J., "American Politics and the End of Ideology," *Brit. F. of Sociology*, Dec. 1963。

坚强的基础上建立一种能满足人们的共同需要、且能成为共同的启蒙与幸福之根源的制度，那么，该社会最有可能充分运用那种品质”。

这些是托尼有关社会目标的设想；这些目标并没有完全实现，但是一直是人们真诚地追求的目标。正如他所说，“对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的是其所设定的目标……”我们现在被告知这是一种老套的想法，因为我们已经将平等原则尽可能合理地置于政策和实践之中。于是，必须设置另一个最重要的目标：简言之，就是增长，或者所有人都被承诺能够通过市场而拥有的更高的物质生活水准。目前仍然盛行的贫困及其他残余的困扰，将会随着时间推移而自动地和从容地屈从于经济增长的决定论。通过自然的市场进程，就可以实现这个目标；随着经济增长的自动扶梯将他们往上抬升，所有的阶级和群体都将满怀期望地站在右派的政治立场上。

这些理论和主张建立在什么事实的基础之上？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主要有两个：第一个问题主要关注与近年来相比的今天的英国社会结构；第二个问题主要与未来有关。经济与技术的哪些方面的变化，有可能促进或减弱支持平等主义原则与政策的理由？

为了严肃回答这些问题，并详细考虑每种不平等以及不平等的所有方面，需要写另一本书或者一系列著作。我们在这里能够做的事情在于，引用一些近年来出版的比较重要的著作，并关注一些相关的资料。^①

^① 例如，参见丹尼尔·詹金斯（Daniel Jenkin）牧师对《平等与卓越》（*Equality and Excellence*, published for the Christian Frontier Council, 1961.）的批判性分析。Williams, Bernard, “The Idea of Equality,”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Society* (ed. Laslett, P., and Runciman, W. G.), 1962; Crosland, C. A. R., *The Conservative Enemy*, 1962.

五

有关英国社会的最引人注目的事实，仍然在于个人净资产所有权的大量集中。根据莱多尔（Lydall）教授与蒂平（Tipping）先生的研究，在1951年至1956年间，1%的人占有42%的资产，5%的人占有67.5%的资产。^①这些比例甚至都被低估了，因为这些数据不包括养老金和信托基金（这些东西在近年来已经大幅增长了），同时，他们也没有考虑一些富人不断将其财产在其家庭内部分配、转移到国外以及以其他方式转移等情况。^②

英国的这种财富集中程度几乎接近于1954年美国的两倍，同时远远高于20世纪20年代早期的美国资本主义辉煌时代的财富集中程度。^③近期英国央行关于股份与债券所有权的报告，揭示了另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如果就像《卫报》（*Guardian*）所评论的那样，这些数据没有被误解的话，那么“机构投资者现在主宰投资界的程度就远远大于伦敦金融城（the city）迄今所能想象的程度”。^④从表面上看，财富所有权的集中和投资决策的集中，看起来是联系在一起的，虽然如果没有更加详细的信息，很难说明它们联系的方式及其后果。

当我们问到近期财富的分配趋势如何这样的问题时，看看美国的情况是有用的（在对英国没有进行详细研究的情况下）。大概自1949年

17

① Lydall, H. F., and Tipping, D. G., *Bulletin of the Oxford Institute of Statistics*, Vol.23, No.1, Feb. 1961.

② 对这些趋向的详细研究，参见 Titmuss, Richard M.,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Social Change*, Allen and Unwin, 1962。

③ Lampman, R. J., *The Share of the Top Wealth-Holders in National Wealth, 1922—1956*, 1962.

④ Bank of England, *Quarterly Bulletin*, Sept. 1963, and *The Guardian*, Sept. 13, 1963.